

針對國民黨“九合一”選舉空前慘敗,輿論的解讀,大多集中在對馬英九和國民黨施政成績不佳、競選策略有誤等方面。既然你沒能很好地回應民意,民意就會借選票狠狠教訓你!這是很多人的理解。在這個理解框架中,選票等於民意,民意等於一切,是不言自明的邏輯。

但這只是流行的理解框架之一。如果先不看馬英九和國民黨,反過來看看選民,會見到另外一個圖景。針對選民結構所做的解讀之一,是新世代崛起了,就是今年春天“太陽花運動”所代表的那個群體,用他們的選票,打破了傳統的藍綠格局。無論國民黨怎么做,馬英九怎么做,胡志強怎么做,都會因為太“傳統”而被拋棄。看起

近年來,中國的外交經常被批“太軟”。在部分民族主義者眼中,當前的中國外交,縱向比遠不如毛澤東時代強硬, 橫向不要說和美俄相比, 甚至還不如周邊的某些小國和弱國,簡直就是“缺鈣”。

而中國外交部門似乎也接受這一評判。有消息稱,最近外交部的領導到中央黨校講課時說,近年來,我國外交上,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,在釣魚島十二海里正常巡航,在南海問題上有理有節的進行鬥爭,給外交部寄鈣片的人越來越少了。

其含義似乎是:以前的確偏軟,近年逐漸硬了起來, 這是工作改進提高的一個成績。

不太瞭解這段談話的上下文,但願不被誤解,因為從外交鬥爭的角度看,這幾乎是亮了自己的底牌。

強者是分等級的。實力強並處處示強,不是真的強;實力強而不急于示強,實力強甚至懂得示弱, 將示弱作為一種有用的手段,為達目的,軟硬兼施,弱強兼示,才是一等的強者。

中國古訓“上兵伐謀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當外交作為國家總體戰略的一個手段時, 必須具有示強和示弱的各種靈活組合,以成為謀略的一部分,只會示強或只會示弱都是蠢笨,無法配合國家總體戰略。

聯繫到近年來關於還要不要繼續堅持“韜光養晦”方針這個似是而非的爭論,覺得很有必要針對中國外交的軟硬標準做一個較深入討論。

大國外交都是隨機應變的

回顧歷史,近代的主權國家外交,起源于黎塞留時期的“三十年戰爭”,定型于拿破崙戰爭的戰後時期。1815 年維也納會議正式通過《關於外交人員等級的章程》,確立了通行至今的大使、公使、代辦三級外交代表制度。

但是,確立下來的只是外交形式,而外交事務的本質, 卻從來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,從未有人規定過一國的外交可做什么、不可做什么。從歷史上看,各大國的外交,無不極具各自的特色, 靈活配合着國家的戰略。

首先要說黎塞留時期的法國,典型的“大國外交”,正是從那時開始的。其時的法國,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之中, 身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斐迪南二世志在恢復羅馬教會大一統、攔除新教、獨霸歐洲, 法國面臨淪為附庸的命運。但“三十年戰爭”結束時,神聖羅馬帝國分崩離析,成了 300 多個小公國,德國的統一延後了兩個世紀,西班牙積弱不振,而法國則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,在此後兩百年里稱雄世界。

這個形勢大逆轉, 正是黎塞留“國家至上”、“利益至上”總體戰略原則的結果。據此原則, 信奉天主教的法國不惜與新教國家瑞典結盟,甚至與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聯盟,以打擊神聖羅馬帝國。為消耗交戰國的實力, 法國故意拖延戰爭, 不惜援助敵人的敵人, 並起用賄賂、煽動叛亂等各種不道德的手段。

那時的外國外交,正是日後世界舞臺大國外交好戲的精彩序曲。各項外交事務, 均圍繞增強法國的霸權、擴大國家利益這一目標展開。外交作為工具,體現的就是“權力增強器”和“權利計算器”的功能。

再看英國。英國外交的特色,是由英國的地緣政治現實所決定的。一個版圖不大、資源有限的島國,能夠稱霸世界,靠得就是兩條:一是盡力防止歐洲大陸出現大的強權, 二是藉助結盟關係補充自身的資源不足。近代歐洲史上第一次大同盟, 就是英國為了對抗路易十四的法國強權而組建的。從那時起,“均勢政治”就成為英國最為持久的外交原則。

正如為了利益不顧道義,英國也為了均勢不顧道義。當年威廉一世組織反法大同盟,但私下里承認,如果他生在 16 世紀 50 年代,也會支持法國反奧,正如現在支持西班牙反法一樣。兩百多年後, 丘吉爾回應對他反德立場的指責時說了幾乎同樣的話:“如果情況相反, 我們一樣可能親德而反法。”

英國外交作為工具,體現的就是“均勢平衡器”或“資源配平器”的功能。

美國的情況又有不同。美國曾長期奉行“門羅主義”,滿足于西半球的偏安,相對於英國積極活躍的“均勢外交”,美國幾乎没什么外交。在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後, 美國的對外政策又充滿了威爾遜理想主義色彩, 批判老歐洲的價值觀,既不講利益至上,也不搞均勢平衡,卻津津于在全世界推行由美國領導的新秩序。

新世代攻占政治舞臺

來台灣新世代要的就是去傳統、反傳統,如果傳統代表了理性,那么他們寧肯放棄理性,擁抱非理性。

不僅在台灣,看看香港也是一樣。“雙學”學聯和學民思潮所代表的群體,就是新世代,他們目前還在一意孤行地堅持佔領運動, 與泛民和建制這個傳統博弈格局越來越沒關係。同樣道理,無論特區政府怎么做,梁振英怎么做,也安撫不了他們,僅僅因為特首和政府都代表“傳統”

“今後將不再需要勢力範圍、結盟、權力均衡,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。過去不幸的歲月里,各國通過這些安排保其安全或促進其利益,今後統統不要了。”這是 1943 年美國國務卿赫爾的一段話。其時二戰尚未結束,美國就把英法從“戰後國際秩序設計小組”里踢了出去。

直到越南戰爭之前,美國都沒有認真對待過外交事務。短短兩百多年歷史中,最為成熟的經驗來自于戰爭,美國自認為是戰無不勝,無論國內的戰爭還是世界大戰,美國都是全勝,所以美國人崇尚軍事力量遠遠超過相信外交技巧。在他們的理想世界里,外交只是裝飾,外交互動剛剛開始, 軍隊已經完成任務了。直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,美國才接受了遲來的教訓。

可以說,1972 年尼克松訪華, 中美關係正常化,美中蘇大三角形成,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質性的外交實踐。美國人終於明白,均勢是現實世界的必需,不是來自歐洲的怪胎。此後的美國,又都逐一擁抱了當年被它否定的“勢力範圍、結盟、權力均衡,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”。

歸納起來說,美國的外交,前期是一種“軍事緩衝器”,後期也變成了“均勢平衡器”。隨着美國國力持續衰落,進入 21 世紀的美國外交也越來越像“資源配平器”了。

作為國家戰略工具的中國外交

通過上述歷史梳理可以看出:現代外交的本質就是工具,推進國家戰略的一種手段。作為工具本身並無軟硬標準, 從極軟到極硬都需要,只要很好地服務了國家總體戰略,就是好的外交。

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。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相當長時間里,中國的外交服務于“獨立自主”、“反霸”和在第三世界“廣交朋友”這幾個總體戰略。前兩大目標都需要強硬,而廣交朋友則需要謙讓和靈活,所以中國外交在改革開放以前,軟硬兩方面都有。硬的時候不惜捲入戰爭,無論是美軍或聯合國軍,還是蘇軍、印軍和越軍,說打就打。而軟的時候,自己勒緊褲帶無償援助友好國家。

到改革開放時期,中國的獨立自主問題基本解決了,反霸目標暫時放棄了,廣交朋友擴大到了全世界所有承認“一個中國”原則的國家,同時, 國家總體戰略轉為充分利用難得戰略機遇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。1989 年,“韜光養晦”、“有所作為”、“決不當頭”等方針出台,成了外交事務總的指導原則。

中國外交被指責“太軟”,主要是在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, 又面臨與周邊國家的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新形勢這段時期。但這並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。由於沒有了反霸這個政治鬥爭, 中國整體上改變了以往橫眉冷對的戰士姿態,轉為和顏悅色的生意人形象。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外交事務也必須整體上從硬到軟。但硬是服務,軟也是服務,硬是配合當時,軟是為了配合現在,在這一點上外交部門並沒有做錯什麼。

過去整體姿態就是強硬,能對美蘇強硬,對任何國家也都能強硬。要求外交官員凡事無論大小一律鬥爭,絕不妥協,從具體的外交實踐上, 反倒容易,不存在做不到的問題。

但現在不同了,整體姿態是和氣,尤其是和周邊鄰居們的關係,加強人員和貿易往來,開展互联互通是大局, 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再重要,也不是第一位的。在這種既要確保大局穩定、又要維護核心利益的複雜形勢下,何時硬、何時軟、硬到什么程度、軟到哪個地步,外交事務也隨之複雜了很多。

但無論怎樣,外交還是工具,而不是國家戰略本身。以近期的對日關係為例,當對日政治鬥爭突出成為國家戰略之後, 外交上的強硬也就自然而然跟上了。劃定東海空識區、釣魚島 12 海里常態化巡航,作為配合性的舉措,為國家戰略提供了服務。

擴大來看,南海要不要劃定空識區?新世紀絲綢之路如何打通?乃至“韜光養晦”方針要不要放棄?其實都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,更不能以軟硬標準來衡量, 都要從國家戰略的需要上反推回來。

一味用軟硬來評判外交事務,太過初級,甚至有失民粹。只有走出這個誤區,中國外交才能日漸成熟。

文 揚2014 年 12 月 10 日

這一點,就要被打倒。看起來香港新世代要的就是去傳統、反傳統,如果傳統代表了理性,那么他們寧肯放棄理性,擁抱非理性。

沿這個方向,能看出新的問題。按道理,有資源、有經驗、有能力的連勝文,不應該輸給完全沒有過從政經歷的“政治素人”柯文哲。按道理,各方公認能力超強、政績卓越的胡志強,不應該敗選。按道理,國民黨即便選輸,也不應該輸得如此不堪,“六都”只剩下一個新北,台北、台中輸掉二十幾萬票,高雄、台南狂輸四五十萬票。即便是原來認為是穩贏的地區, 贏得也很驚險。

但選舉結果完全沒給“道理”留位置,一切都出乎預料,甚至匪夷所思。民意可以很理性,也可以沒理性,非理性,這一次,新世代要的就是非理性。敗選後的胡志強說,國民黨會輸,是因為不瞭解年輕人。現在年輕人認為“你給我的是應該的,沒給我的是欠我的。你給他 iPhone5,他會氣你沒有給他 iPhone6”。

老胡的這句話,用到香港更正確。自佔中開始以來,社會各界對於“雙學”的各種勸誡統統不起作用, 提醒他們違法行為影響前途沒有用,勸說他們對政改方案“袋住先”沒有用,告訴他們不要指望中央改變決定沒有用。因為他們就是認為“你給我的是應該的, 沒給我的是欠我的”,而他們心目中那個“國際標準的真普選”就是欠他們的,不給就天天鬧。他們正是“你給他 iPhone5,他會氣你沒有給他 iPhone6”的一代人。

也許可以說, 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是這樣,這一代人無非表現得更過分了一些。但重要的是,在過去,年輕人的少不更事和非理性總會被各種理性力量所遏制,所約束,不會影響到全社會,更不會左右政治。可現在不同了,在西方民主模式影響下,選票等於民意,民意等於一切。理性還是非理性,成熟還是幼稚,深思熟慮還是一時沖動,高瞻遠矚還是短期行為,兼顧各方還是只顧自己,統統不重要了,誰有本事左右選票,誰就代表了最高意志。

今日台灣正是這樣。唯選票是瞻的“選主政治”代替了真正的民主政治,各種沖動的、偏執的、短視的、自私的、不負責任的非理性政治訴求, 都在貌似公平的普選遊戲掩護之下粉墨登場了。

iPhone 時代的年輕人,不僅人數眾多,而且精力充沛、能量巨大,除了他們手中的選票,他們還通過引領新的社會潮流、創造新的政治文化、構建新的社交平台等等途徑, 百倍地放大了他們的影響。台灣選舉過程越來越“小學生化”、“動漫化”、“娛樂化”,越來越偏離政治的嚴肅本

質,正是這個內在趨勢的外在表現。

此次“九合一”選舉的結果,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性事件:在台灣,新世代藉助普選佔領了政治的中心舞臺, 他們正在用其非理性行為宣佈他們的勝利。

郭台銘一直在代表理性發出吶喊:台灣快要沒

有時間了!台灣越來越賺不到錢了!此次選舉之後他會發現: 他和他所代表的整個工商界都已經身處邊緣了。雖然他們的商業理性從邏輯上無可挑剔,但很遺憾,非理性正在成為台灣的主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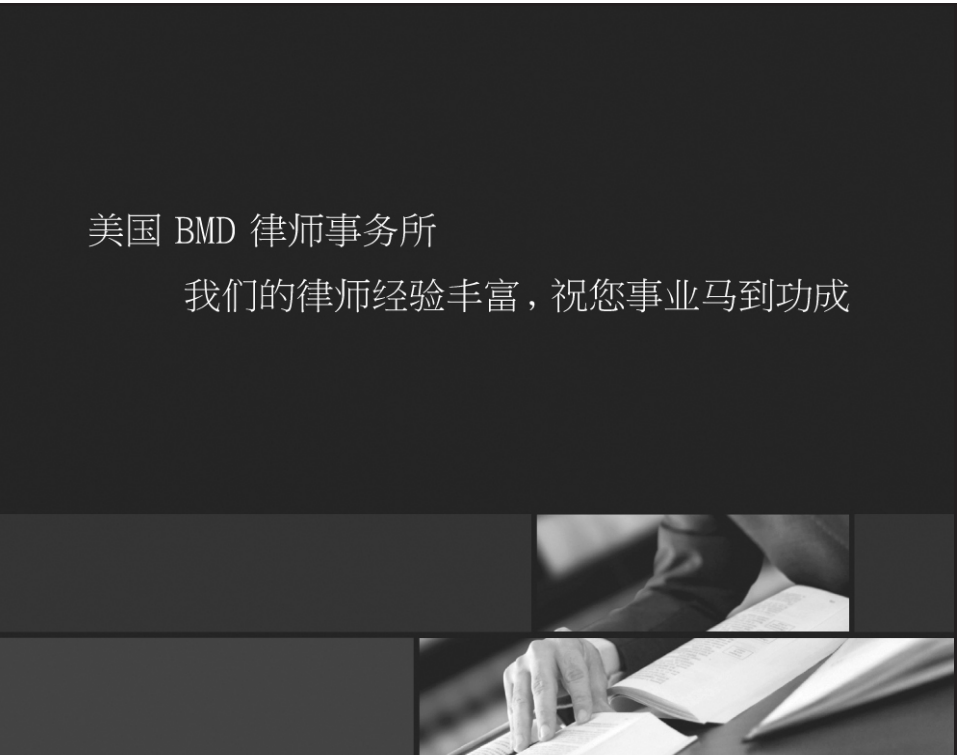
對照之下, 香港的新世代還在進軍政治中心舞臺的路上, 他們面前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為香港普選設定的限制框架。新世代將其視為是針對他們這個群體的一個閘口, 不拆掉它就不可能進入中心。

回顧人類歷史,政治常常表現為世代之爭。互聯網和 iPhone, 大大增強了青年人的攻勢,而因為普選,政治舞臺率先淪陷。

如是觀之,民進黨也不要高興太早。無黨籍人士柯文哲在台北的勝選, 同時敲打了藍綠兩營。如果新世代的進軍勢不可擋,政治舞臺上 iPhone 一族取代花鏡一族,世代之爭取代政綱之爭甚至統獨之爭,那么,今天推翻國民黨的力量, 明天同樣會推翻民進黨。

從今年 3 月的台灣“太陽花”學運,到 10 月的香港“雙學”佔中,再到今天的“九合一”選舉國民黨慘敗, 一步步清晰地標示着港台新世代攻佔政治舞臺的進軍腳印。

文 揚 2014 年 12 月 3 日



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

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

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，能为您提供在商务、房地产、税务、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。

欲了解更多详情，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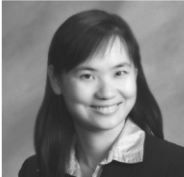
BMD

BRENNAN, MANNA & DIAMOND
ATTORNEYS & COUNSELORS AT LAW

地址: 75 East Market Street, Akron, Ohio 44308
网站: www.bmdllc.com



唐永昶律师
电话: 216-534-1317
电子邮箱: jtang@bmdllc.com



徐佳佳律师
电话: 330-253-9195
电子邮箱: vxju@bmdllc.com